

以中國文化觀點分析 國內社區工作推廣之困境

黃俐婷

壹、前言

隨著日前社會福利去機構化的趨勢，社區工作的重要性亦相對性的提昇。臺灣自民國五十四年以來，社區工作已逐步以階段性的方式推展，儘管其呈現名稱由早期的「社區發展」到民國八十三年之「社區照顧」，甚而進展到民國八十五年至今的「福利社區化」，其共同之重點皆在重視社區居民的需

要、社區居民的參與以及社區資源的整合，進而提昇社區生活的品質。然而，多位學者針對推動福利社區化之實務研究皆指出社區工作普遍存在「社區居民參與不足」以及「社區資源整合運用」的困境（楊瑩等人，民八

八；翁毓秀等人，民八八）。

社會工作在評估問題時，常以「人在環境中」的觀點來分析，因此，社區工作推展的困境，亦須考量環境內的文化因素。文化中會「規定」人們應該和環境之間保持何種適當關係，亦即各社會文化脈絡中，皆有其問題解決方式及其目標的特殊性（曾華源等人，民八五：五三至五四），基於此，本文嘗試以中國文化觀點分析社區工作推展之困境，在探討的同時，仍然肯定社會工作源於西方的思想，並認為在原有的理論基礎下融入「中國文化特色」的關注與考量，對於社區工作之處遇成效有著關鍵的力量。

貳、社區工作的定義

徐震（民八一）認為社區一詞，是一涵意複雜的名詞，各專業對此一名詞的用法未盡一致。如從社區地理或結構的概念來看，可以用來指一特定社區中所有的民眾，其大小可分為村落、城鎮、都市、大都會區等。從心理互動的概念來看，可將社區視為居民相互關連的網狀體，居民能形成某些共同的特質，如態度、傳統、語調等。從行動及功能的概念來看，社區具有動力的觀點，希望藉由居民的結合，自行發現其共同的利益、需要，並自求解決之道。綜合而言，社區是特定的一群人由於地緣關係而形成有點黏又不

會太黏的社會團體系統，並發揮自助互助的精神，由於社區之於家庭、社會到國家有其實質上與精神上的功能，因此，社區工作

的重要性更形突顯。

國內外專家學者對於社區工作的定義亦有異同的看法，楊瑩等(民八八：八至九)指出社區工作方法是從事社區中一切事務等最基本的實務技術，即社會工作者針對某一特定地區運用直接與間接的社會工作方法，提供各項福利服務以滿足當地居民的需求或解決社區中所發生的問題，並綜合定義社區工作為一種解決及預防問題的方法、過程並重視社會資源的開發，其主要精隨是社區民眾的積極參與及社區資源的充分利用。類似的定義則有梁祖彬指出社區工作是透過專業人士、政府部門或民辦組織的介入，解決社區內的問題，改善服務設施及環境，提高生活素質，並加強居民與政府的溝通，這個看法大致脫胎於一九六三年聯合國對社區發展的理解(甘炳光等，民八五：五)，進一步將社區工作的推動對象包含在此定義內。

更完整的定義則指出社區工作是以社區為對象的社會工作介入方法，它透過組織內居民參與集體行動，去釐定社區需要，合力解決社區問題，改善生活環境及素質；在

參與過程中，讓居民建立對社區的歸屬感，培養自助、互助及自決的精神；加強市民的社區參與及影響決策的能力和意識，發揮居民的潛能，培養社區領袖才能，以達致更公平、公義、民主及和諧的社會(甘炳光等，民八五：十七)，此項定義則將社區工作的目標、服務對象、服務方法與過程重點作了一個統整性的說明。

國外的學者 Taylor & Presely 則認為社區工作是一種致力於提昇非專業人員之專門技術的專業，亦是一種提昇處於困境者的能力，以便增進他們對自己所處環境之控制的專業(楊瑩等人，民八八：八)，類似的定義亦強調社區工作的基本目標在於增進參與者解決社區問題的信心與能力(Popple, 1995:5)。

綜合以上，對於社區工作的定義，我們可歸結出以下要點：

- 一、是社會工作的一種方法。
- 二、是運用集體行動的一種過程。
- 三、過程目標重視社區居民的參與以及社區資源的運用。

四、任務目標則在於解決社區問題，改善社區生活品質。

參、國內社區工作推展之演進

臺灣於民國四十四年承襲過去在大陸地區鄉村建設運動的經驗推動「基層民生建設」，民國五十四年行政院頒布「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將「社區發展」列為社會福利措施七大要項之一，並自民國五十七年訂頒「臺灣省社區發展八年計畫」開始推動(唐啟明，民八十六，十三至二十一；江亮演等人，民八九)，至民國八十年有一個轉捩點，政府頒佈了「社區發展工作綱要」，使以往政策執行的基層單位轉為以民間為主導，亦即由社區民眾以自行組織社區發展協會之方式辦理，以達到自發自足及自治之目標。至此，臺灣的社區工作仍侷限於基礎工程、精神倫理和生產福利建設的作法，對於福利社區化目的的思維空間不足(萬育維，民八十

四：五十三至六十一）。直至民國八十四年在國家建設研究會與全國社區發展研究中提出為落實社會福利政策，社會福利應推動社區化，並建議加強各項社會福利設施及服務方案，開始研擬「有系統、整合性的「社會福利社區化」推動策略」。並於八十五年五月頒訂「加強推展社區發展工作實施方案」，明白揭示「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化」（陳武雄，民八十六：四至九）。

自此之後，福利社區化的推動原則明確的走向多元系統的福利服務體系，亦即政府不再是唯一提供服務的單位，而是強調政府、志願性、商業性及非正式性等四個部門，皆為社會福利資源的來源（萬育維，民八十四）。在社區化的過程中，社區是主導角色，政府是輔助角色，甚至接受照顧的人也有參與及倡導的角色。福利社區化一方面是非正式的社區照顧，另一方面又是一種有組織、有計畫的將各種福利輸送到社區，而確保各種福利落實於基層的工作，社區的福利能量及社區的自制能力，實關鍵著福利社區化的成敗。（劉弘煌，民八十七年）。

綜合而言，社區工作的實務模式不管是由傳統的社區發展、社會計畫、社會行動模式到最近整合的福利社區化模式，都可發現民國八十四年可說是國內社區工作推展的關鍵年代，即由社區發展模式轉變成福利社區化模式。同時，不管是哪種名稱，皆強調「社區居民的參與」、「社區居民的自助與互助」、「社區內外資源的運用」等主要要素，再者，福利社區化模式的實質內涵更包括非正式的社區照顧資源、機構提供的正式福利服務以及兩者的資源整合，以實踐取之於社區、用之於社區的主要精神。

肆、我國社區工作推展之困境

臺灣地區推行社區發展已有二十餘年，雖然有助於基層、偏遠地區的基礎建設、保健衛生改善及社區意識增強，但也因法令及觀念不足，未能真正激發地方參與，而造成推行困難。檢討的原因包括偏重物質建

設、成果不易維護；社區意識無法建立、相關單位配合不足；推動福利社區化觀念及作法有待釐清；社區發展定位不明，缺乏法令規定（江亮演等人，民八九：三一五至三一六；葉至誠；民九一：三二九至三三〇）。

陶蕃瀛（民八九：八九至九二）亦指出類似的困境，包括政府積極指導，社區居民的參與不足；政府指定項目，資源錯誤配置；政府負責推動社區發展的單位孤君奮鬥；社區區域太小，自主性可能太低；缺少基層社區組織，社區發展基層領袖不足。在這樣的困境下，我們不難發現政府在社區工作的推展過程中，仍扮演著主要的角色，「由上而下」的觀念深入人心，難以改變。

再者，楊登等人（民八八）針對彰化縣鹿港鎮「推動福利社區化」的研究指出在計畫執行初期所遭遇之難題包括缺乏完善的整體規劃、缺乏事前的需求評估及消費者代表的參與、工作小組的經驗不足、多數方案過於缺乏創造性、以專家模式主導致使社區居民缺乏自主性、財源完全來自政府而受到政策時效的壓力與限制；接著在計畫執行中期遇

到的難題，則包括經費核撥遲緩而影響方案的推展、部分社區或機構內部的和諧與共識不足、社區務實態度尚待考驗、社區過度依賴補助、付費與否的困難、喚醒社區居民的參與尚待努力；最後在計畫執行後期遇到的難題則包括民間團體或機構負責人改選過於頻繁、以利為誘因的社區工作尚待突破、志工流失嚴重、開辦時的衝勁難以維繫、社區聯合服務中心的功能難以發揮、民眾對福利資源使用動機偏低、既有資源難以充分運用。以上所指不管是執行的那一階段，相關的研究亦出現類似的困難（翁毓秀，民八八）。

由以上的困境整理，是否代表我們在推動社區工作的同時，亦出現所謂的「迷失」，黃源協（民八八）依其參與推動的經驗，歸納出福利社區化的十大迷思包括：（一）以「社區發展協會」之「社區」為範圍可行嗎？（二）福利社區化抑或村里化？（三）「福利社區化」就是「社區發展」？（四）「由下而上」的福利社區化可能嗎？（五）志工是福利社區化的主角？（六）福利社區化是免費的服務？（七）福利社區化的服務應遍及各類人口群？（八）

福利社區化是在滿足需求或是誘發需求？

（九）福利社區化可整合既有的資源嗎？（十）福利社區化能立即在社區生根嗎？

諸如此類長期的困境與迷失，持續存在二十多年而難以更動，可以歸結出以下兩大主要困境：

一、社區居民的參與不足

居民過於依賴政府、專家，使得社區工作流於「由上而下」，彼此之間的自助與互助形成不易。

二、資源整合運用的困境

包括政府資源配置問題、民眾對福利資源使用動機偏低、既有資源難以充分運用、社區過度依賴補助、付費與否的困難以及以利為誘因的社區工作尚待突破。

伍、以中國文化觀點分析國內社區工作推展之困境

文化中會「規定」人們應該和環境之間保持何種適當關係，以「人在情境中」的觀點而言，個人如何表現行為，在團體中如何與人相處，亦要考慮到整個社會環境的認同程度，亦即各社會文化脈絡中，皆有其問題解決方式及其目標的特殊性（曾華源等人，民八五：五三至五四），因此，針對目前國內的社區工作推展之困境，除了須考量社會工作的起源、方法與原則都是英美等歐美國家的思想，並源自西方的基督宗教信仰外（簡春安，民九一：八），實則因為社區居民是活生生地存在於國內的土地上，所謂本土的在地文化是社區工作發展過程中不可忽略的，再者，這部分仍然與社會工作的基本理念「人與環境之密不可分」是不謀而合的。筆者以為，社區工作推展的困境背後，大環境具有的文化價值可以說是相當重要的環節，因此本文試圖以社區工作推展的兩大主要困境作初步的探討。

一、社區居民參與不足

的困境

依據學術界與實務界的觀點，我們都可發現社區居民的參與普遍不足是目前存在的重要問題，甘炳光等人(民八五：四一)界定市民參與是指本身並非政府官員及政治家的社會大眾，對於一些有關他們生活素質的政策作出影響的活動。它有四個特點：參與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活動。參與的主角是一般市民。參與的目的是監督政府的工作，促進政府對市民的需要作出有效回應及交代。參與的架構及活動可由市民自發地組織，透過一些非正式的途徑表達意見。

然而，不少調查卻顯示在現實生活中積極參與的人士只佔極少數，大部分市民對於參與社會事務都表現冷漠或只作旁觀者；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人都是教育程度及收入較高的一群，因此，參與制度一般都間接維持了社會不平等的現象(甘炳光等人，民八五：四四)。

再者，社區發展是一個必須與社區居民生活結合的多面向發展工作；然而臺灣地區

社區發展工作推行二十多年來，一直未能突破居民參與不足的困境(陶蕃瀛，民八九：八九)，直至福利社區化時代的來臨，仍有居民社區意識不足，參與觀念及行動難以形成的阻礙。

妨礙居民投身社區參與的因素包括個人因素、社區環境與社會政治文化三者，個人因素主要指個人之工作與生活壓力、缺乏有關的知識與技能、負面的生活經驗和社會印象以及缺乏自信心；社區環境因素主要指惡質的社區環境、社區資源缺乏；而社會政治文化因素則包括強烈的無助感與疏離感、傳統中國人的順民性格、功利主義及個人化傾向、政治決策仍然是官僚化及由上而下(甘炳光等人，民八五，三二二)。

由以上居民參與的不足，我們可以歸結出其背後中國文化的觀點如下：

(一)社會取向性格

多位專家學者指出中國人所謂「社會取向」的性格，通常被定義為一種由社會服從性，不得罪人的策略及順從社會期望與權威等性所組成的複雜行為組型(Yang, 1981；黃

光國，民七七：二七)。對於週遭之人之認可與否極其敏感，極怕失面子，極愛榮譽(項退結，民八二：四三八)。換句話說，中國人的自主性較低，妥協性較高，較尊重權威，易於受外在他人及社會規範所影響。

在這樣的性格下，中國人是較無自我的，因此，個人無法自由地做他想做的事，以致於中國人大體上都顯示出對於變革較高抗拒與焦慮(曾華源等人，民八五：五七)。然而，推動社區實務工作，一再強調的是「社區居民的參與」，這個概念的核心要素包括自主、自助，並為解決社區問題有實際的改變行動，相較於我國之社會取向性格，國人對於社區問題的參與改變是相當陌生的，甚至認為我們的政府即所謂的「權威者」是社區問題的主要負責者，社區居民可能多數並不認為「自己」才是主要的負責者，以此觀點來看，要形成所謂的「社區意識」更是不易。

(二)集體主義取向

集體主義的特徵為個人的內團體少，排外性強，人際關係之間的權利距離大，最重要的人際關係是垂直者如父子，對事評價比

較是因入而異，內團體的關係雖然親密和諧，對整個大社會卻顯得淡漠不和諧（李美枝，民八三：二七二）。然而源之於西方的社區工作概念卻講求人際間之平權關係，認為推動社區工作需視全體居民的需要，並以就事論事的科學方法來喚起居民參與，此點與國人對社區的關係界定是相當不同的。

國人關心的是自己以及家人這個內團體，除非已威脅到內團體的生存，否則打破界限，突破框框，自己主動為家裡以外的社區作事情，並與其他居民平起平座的為社區問題作討論，對國人而言，是很陌生又不習慣的，需要以一個所謂的「社區精神領袖」來指導，才能符合集體主義的性格傾向。

在國內的社區工作推展過程中，值得一提的就是所謂的「派系樁腳」之角色，相關研究指出派系問題對於國內地方自治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曹建文，民九一；林男固，民九十）。換句話說，「派系樁腳」可說是內團體的延伸，為了鞏固自己人集體的利益，地方派系往往扮演著社區工作發展的推手，在經濟、政治等因素的互相影響下，使得社

區工作流於少數人形式上的參與，而非多數民主的參與。

（二）權威人格取向

中國人在為人處世的態度中，「權威性格」亦常被提及，權威性格的人格特質包括苟襲慣例、因循舊習；無批評的接受權威，好攻擊一譴責、拒斥及懲罰破壞陳規舊矩之人；迷信；思想刻板；重視權勢，強調嚴峻；不信任他人；反科學（楊國樞，民七八：一二八）。它的特徵包括「順從」天意、長者以及有政治、社會地位的人並順從已有的社會規範；尊重過去的知識和經驗；看重集團的名譽和利益（文崇一，民八二：五七）。因此，國人顯現於外的表現傾向服從上級的決定，認為自己的命運是操控在有權的人手中，順服慣了就形成妥協依賴、缺乏勇氣與創造力的性格傾向。

再者，國人對待政府的兩種態度是距離和認同，距離的存在是指心理上的聯繫十分薄弱，所謂「天高皇帝遠」，認同所指的是順服權威，認同政府的責任角色並認為政府擁有較多的資源與權力（許琅光，民七七：二五

二），因此，社區工作的推展，居民會依賴政府權威，期許政府的補助，然後對於自己要付費是不太能接受，認為付費作社區工作是政府這個大家長的事，自己沒有「自我負責」的意識。

權威性格的養成，反映在依賴政府與專家過程中，致使國人較難嘗試主動覺察社區需求，多方思考解決方法，更不熟悉「由下而上」的向權威提出挑戰，尋求具體變革等諸如此類的社區行動。

綜合以上社會取向、集體主義及權威性格的文化觀點分析，可以發現國人對於社區工作問題的解決，會較採用他人的看法與期望來作考量，這裡的「他人」尤其是指代表權威的政府或專家。對於自我負責來解決公共問題，是不太習慣的，因此，居民的參與較難「由下而上」，亦較難自助與互助。

一、資源整合運用的困境

就社區發展的特性而言，充分發掘與開發資源是社區發展過程的主要方法或程序

(劉弘煌，民八九：三八；李建興，民八三)；再者，多位學者指出社區資源在落實社區化福利服務的重要性(施教裕、林勝義、劉弘煌、張英陣、萬育維、楊瑩、翁毓秀等，民八八)。因此社區資源整合運用就成為落實社區工作的重要環節。

通常社區資源的分類，大致上可分為三種分類：其一分為物質與非物質的資源(翁毓秀，民七六)；其二為有形與無形的資源(劉弘煌，民八九；李建興，民八三；謝玉新，民八二)；其三為正式與非正式資源(Halley, 1992)。此三種分類以第一、二種較為類似，即有形的物質資源包括天然資源、物力、財力及組織；有形的非物質資源主要為人力資源；無形的非物質資源則包括知識與技術、組織及結構、協調與合作精神、社區意識等；其三的正式與非正式資源則相較於前二種分類更強調有形的人力資源與組織資源，正式資源包括組織或正式協會成員，如社區發展協會；非正式資源則包括家人、鄰居、朋友、同事及其他協助者。

社區居民所需要的服務包括了各項福

利服務如衛生保健、醫療、環保、治安、教育、交通等都需要社區內的各類資源來協助解決這些問題或滿足社區居民之各項需求(劉弘煌，民八九：三九)。因此，社區資源的多寡以及居民如何使用資源？都成為社區工作推動的基礎。國人則傾向運用並相信非正式資源，也就是屬於所謂的「自己人」，這樣的資源運用特性，致使我們對於所謂的「社區內不太熟悉的人」，保持著有點黏又不會太黏，有點熟又不會太熟的模糊距離，進而造成了社區資源整合的困境。

依據多位學者針對國內社區資源的研究與觀察皆發現目前社區資源整合出現的困境大抵包括：人力、財力之資源不足，對政府資源過度依賴，在資源連結過程中偏重同質性原則，組織本身的本位主義(邱瑜瑾，民八八；萬育維，民八六)。換句話說，國內社區資源的整合存在著「基本有形資源欠缺」、「下對上的依賴權威」以及「採用熟悉性與利己性的原則」等特性。這類特性可引用以下的中國文化觀點來作說明。

(一)差序格局的資源運用觀：

自己人為先

傳統中國人非常講究社會關係中的「差序格局」，他們常常用不同的標準來對待和自己關係不同的人；意即通常在資源運用時，往往考慮的是雙方之間具有怎樣的「關係」，這種「關係」又有多強？

再者，中國社會中個人擁有的三大類人際關係通常包括情感性關係、工具性關係與混合性關係，每種關係的資源運用法則又不太一樣。情感性關係通常是一種長久而穩定的社會關係，通常家庭最能符合此類特質的需要，其資源運用之法則是「需求法則」即「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工具性關係是個人在生活中和家庭外的其他人建立工具性關係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獲得他所希望的某些物質目標，此種關係基本上是短暫不穩定的，其資源運用的法則是「公平法則」；混合性關係則依據「人情法則」即以「人情」和「面子」作為資源運用的主要考量原則，此類人際關係的特色是：交往雙方彼此認識而且是有了一定程度的情感關係，但其情感關係又不像家人般那樣深厚到可以隨意表現出真誠的

行為(黃光國，民七七：十三至十七)。

基於以上三類關係資源運用的法則，我們可以發現國人在資源運用時，對於陌生人所關心的是「公平與否」，因此國人不太能與陌生人共享資源；這正可說明國內社區資源整合大多運用「同質性、熟悉性的資源」的特性。

此外，我們亦可用「混合性關係」來看自己、甚至家人與社區間的關係，為了維持自己與家庭的「情面」，國人在社區中常常講求人際間的和諧，並避免衝突的發生，然而社區工作的本質上是要建設性的解決社區內存在的衝突，例如鄰居製造的噪音問題，為了使社區生活品質更好，勢必需要「就事論事」，然而，國人是慣於「就人論事」的，因此為了維持團體的和諧，遇到社區問題往往以「隨遇而安」、「被動接受」、「壓抑忍耐」來顧全情面，也只有在自己家人面前才能真誠表露內在衝突，所以家人與社區的關係不太算「自己人」，要「以和為貴」、「明哲保身」。

(一) 家族主義的資源運用觀

國人由於缺乏「自我」的意識，問題發

生時較難運用自我分析、判斷與表達的能力，亦較無意願突顯自我的需求、感受以尋求問題的改善與解決問題，所以在問題來臨時，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家人、親友的想法，所謂「家醜不可外揚」(曾華源等人，民八五：五八)；同時，生活經驗較侷限於家族關係網絡內，中國人對其他人的問題一般都喜歡作旁觀者，正如俗語所謂的「各家自掃門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甘炳光，民八五：五十)。

家族主義所產生的國民性格是愛好和平，不但在平時及日常生活要和平，甚至在非常時期，面臨危機，也會不惜在道義和氣節上作重大犧牲，即所謂的「忍辱求全」，以求維持和平。在生活中講求淡泊、安靜、隱藏、平常，不喜歡衝突，亦不太敢冒險，這樣才能與鄰里社區中少有衝突傷害(楊懋春，民八二：一四四、一五三)。

基於這樣的文化背景，國人對於所謂的「社區需求」可說是隱藏而不表達的，為了求得和諧避免衝突，更難以訴諸理性行動解決問題，因此，即使遇到的社區問題與家人

生活品質有關，亦多半作認知上的轉換，如果是關乎本身不痛不癢的社區問題，更易於呈現冷漠被動的態度，以「趨吉避凶」，不冒險不衝突，就可獲得安定與和諧。

(二) 宿命主義的資源運用觀

就中國傳統文化而言，「天人合一」是一種至高無上的精神境界，天人之間似乎存有一種神秘的關連，因此，占卜成了指導人們行事的重要手段(霍靈，民八十：一五六)。

顯而易見的，中國人的宇宙觀是講求天命的，俗話所說的「盡人事、聽天命」，正反映了國人遇到問題時傾向以命運觀點來看待事情，因此，有所謂的祭天求雨等民俗儀式，再者，國內廟宇人潮絡繹不絕，求神問卜的現象持續不斷，皆表示不管是個人問題的解決，或者社區生活的改善，國人通常會將求神的行為擺在自助與互助的前面。

在這樣的民俗風格下，社區內的廟宇就成為一個社區居民的精神支柱，並儼然成為政府之外的更高權威，對於社區居民「由上而下」的慣性，產生的不可動搖的天意力量，因此，由居民自主的「由下而上」參與觀念

對於中國人而言是十分陌生的。

綜合以上三類資源使用的中國文化觀點：即差序格局、家族主義與宿命主義，皆可表示國人在社區資源使用的慣性上，傾向於運用非正式資源，尤其是自己的家人，對於問題的解決亦充斥著求神文化，因此屬於「非自己人」的社區居民及其資源，較無熟悉感，大多會有避免衝突及冒險的傾向，就此而論，資源整合之有限，多半就是這樣的本位主義所使然。

陸、推展社區工作的 本土化原則

一、強化家庭與社區的關係

多位學者指出家族主義仍然是中國人重視的一項價值(黃光國，民七七；鄭伯璵，民八十；楊國樞，民八四；曾文星，民八五)，家庭對於社區工作之發展具有非正式資源當中不可抹滅的力量。

社區是介於國家與家庭的單位，家庭則是社區與個人間的連結，因此，家庭常被社會學者視為最具代表性的「初級團體」，表現出連結、中介與協調的功能，因此，當一個人需要照顧時。家庭是第一個考量，而照顧的對象不外乎是老人、兒童及身心障礙者(賴兩陽，民九一：四八)。

除了個人本身外，家庭是福利供給最基本亦是最主要的來源，家庭支持係成員之間基於血緣與情感而產生的資源轉移，在所有非正式福利中，家庭是最親密亦是最自然的安排，亦是最主要的福利提供者。八十年代後，基於去機構化及其他人道的關懷，將家庭與社區結合發展成社區照顧，所謂的社區照顧是指動員並連結正式與非正式的社區資源，以協助有需要照顧的人士(萬育維，民八五：一〇八至一一一)。

綜合以上各點，儘管家庭在社區中扮演的角色是如此重要，然而，目前臺灣有關家庭社會工作的現況並未突顯，僅附帶在有關對象的服務上面，同時並未以整體家庭為服務之考量(周月清，民八三：五四)，在社區

工作發展的同時，整個社會環境亦面臨家庭結構的變化、家庭功能的式微，因此要突破社區工作之推展困境，家庭社會工作的倡導與重視實有必要。

一一、融入民俗取向的資源

在國內民俗傾向的求助模式相當普遍，可能是因其物理環境與服務方式較符合中國人的文化。例如求助於廟宇，符合國人認為自然支配人間的宇宙觀，而算命會如此普遍，亦與國人認為冥冥中自有定數的宿命觀息息相關(曾華源等人，民八五：五五)。因此，善用民俗取向的資源，融入社區意識的凝聚並帶動社區工作的推展對於突破社區工作的困境是值得採行的做法。

楊瑩等人(民八八：一九四)針對彰化縣鹿港鎮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化」研究指出潛在資源的開發與連結若能獲得許多著名寺廟的協助，將可使資源因整合而發揮最高的效率。再者郭銀漢等人(民八九：七三)指出地方寺廟之祭祀圈與西方社區概念緣起，頗為

接近，兩者均為有地理界限之人口集團，成員亦有地緣的感覺或某種集體意識與行為，廟宇更是中國社會最佳之社區服務中心。由此表示，寺廟展現的人氣對於社區意識的凝聚有著重要的意義。

再者，郭銀漢等人(民八九：六二至七八)以新港鄉奉天宮為例探討地方寺廟對社區意識發展的貢獻，結果發現奉天宮對新港社區意識形成具有催化作用，首先以媽祖信仰結合社區居民並積極從事社區紮根工作，如補助經費改善小學設備、創建忠齊圖書館等，並捐建公園改善社區休閒環境，其次以傳統春節「抽公籤」預測社區全年之運氣及媽祖出巡遶境活動，來延續居民對媽祖信仰之認同，更值得一提的是以專案補助的方式來協助新港文教基金會之成長，辦理社區性活動。

有緣於國人「盡人事、聽天命」的宇宙觀，結合廟宇等民俗取向資源推動社區工作，可說是相當具有參考價值的本土化原則，不僅符合當地風土民情，同時可切合社會福利服務輸送之可近性、可接受性等特質。

玖、結語

隨著社會的變遷與日益現代化，社區工作的推展有賴於中西文化價值的同時並進、相輔相成。在既有的社區工作理論基礎下，肯定西方的現代化價值，並融入中國文化因素的考量，更能符合社會工作「人在情境中」的觀點。本文試圖提出社區工作推展的主要困境：即「社區居民參與不足」及「資源整合運用困境」兩項困難點，並分別討論背後的中國文化因素，前者包括社會取向、集體主義與權威取向觀點，後者包括差序格局、家族主義與宿命主義的資源運用觀，最後並嘗試提出推動社區工作的本土化原則，即「重視家庭與社區的關係」以及「融人民俗取向的資源」兩項原則，期以增添社區工作推展的文化觀點。

(本文作者為玄奘人文社會學院社會福利學系兼任講師)

◎ 參考文獻：

- 甘炳光等編著 社區工作—理論與實務。臺北五南 民八五
- 李美枝 從有關公平判斷的研究結果看中國人之「己」關係的界限 於本土心理學研究 桂冠 民八三
- 林男固 地方派系依恃動員結構的演變與特質—高雄縣內門鄉的個案分析 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論文 民九十
- 徐震 社區與社區發展。臺北 正中 民七一
- 唐啟明 臺灣省社會福利社區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社區發展季刊七十七期 民八六 十三至二十一頁
- 曹建文 社區成人教育及組織策略介人社區組織運作之行動研究—以嘉義市西區劉厝社區發展協會為例。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 民九一
- 陶蕃瀛 社區發展工作的基本原則與方法 於新臺灣社會發展學術叢書 八十至一〇三 臺灣省社會發展研究學會 民八九
- 翁毓秀 推動社區福利社區化之研究：以臺南市安平區為例。內政部社會司專題研究計

畫 民八七

陳武雄 我國推動社會福利民營化的具體作法與政策發展 社區發展季刊 八十期 民八六 四至九頁

郭銀漢、黃秀瑄、莊金看 地方寺廟對社區意識發展之探討於新臺灣社會發展學術叢書 六二至七八 臺灣省社會發展研究學會 民八九

許琅光著 徐隆德譯 中國人與美國人。臺北：巨流 民七七

黃光國 中國人的權力遊戲。臺北：巨流 民八一

黃源協 社區照顧－臺灣與英國經驗的檢視。臺北：揚智 民八九

曾華源、黃俐婷 我國社會工作專業教育本土化必要性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 第七六期 民八五：五三至六十頁

張英陣 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臺北：洪葉 民八七

萬育維 福利社區化的另類思考——以成人智障者及其家屬為例。厚生雜誌(五) 民八七 四至七頁

萬育維 社會福利服務－理論與實踐。臺北：三民 民八五

萬育維 社會工作概論：理論與實務。臺北：雙葉 民九十

詹火生、古允文 新世紀的社會福利政策。臺北：厚生基金會 民八七

詹火生、古允文 社會福利政策的新思維。臺北：厚生基金會 民九十

楊瑩、黃源協等人 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化之研究－以彰化縣鹿港鎮為例 內政部社會司專題研究計畫 民八八

楊懋春 中國的家族主義與國民性格 於中國人的性格 桂冠 民八一

項退結 中國國民性研究及若干方法問題 於中國人的性格 桂冠 民八一

雷霆 中國人的「自我」與「自己」：形上與形下、新理與心理 於中國人中國心－人格與社會篇 遠流 民八十

葉至誠 社會福利服務。臺北：楊智 民九一

賴兩陽 社區工作與社會福利社區化。臺北：洪葉 民九一

簡春安 二〇〇二本土化助人專業社會工作

發展趨勢 「本土與創新」社會工作助人專業新模式研討會 民九一。

劉弘煌 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化之研究：以臺北市文山區為例。內政部社會司專題研究計畫 民八七

劉弘煌 社區資源的開拓、整合與分配。社區發展季刊 民八九 三五至五二

蔡漢賢 社區發展的回顧與展望。臺北 華岡 民七八

陶蕃瀛 社會福利社區化與社區照顧的推動原則與問題 第八屆東海大學社工系師生論文發表論文集 民八七

Yang, Kuo-shu(1981) Social Orientation and Individusl Modernity among Chinese Students in Taiw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13:159-170.